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

——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王新宇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关键词] 朱子;经史;义理;《春秋》;《左传》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3)03-0105-12

经学与史学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载体。四部之分科虽犹在其后,然经、史二者之关系问题的表现则渊源甚早。晚近“六经皆史”说的提出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讨论,实则是对传统经史关系的集中回应,因此,不妨可以说“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将经、史二者放在统一的维度进行思考,并力图重新融合为一——当然这一努力偏向于古文家的视角。近代以来,“六经皆史”融合经史的初衷却日渐成为传统学术裂解的借口,例如“六经皆史料”说试图将经学的一部分归入历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则希望将经学融入哲学;文学亦然——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随着现代学术分科的日益加剧,不仅经、史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经学作为传统学术之主干也被肢解为不同的学科,《春秋》之被视作历史书即其一例。然而,早在太史公《史记》那里,史书就已尝试借助《春秋》经术而走向自觉,史公受学于董子,其视角显然偏向于今文学。由此再上溯至孔子,孔子作《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其文则史。”然则《春秋》为经乎?为史乎?经史之间的这一复杂关系,自孔子《春秋》以来,千古聚讼,莫衷一是,《春秋》今、古学之间对于经史关系的讨论也不绝如缕。本文并无意于全盘地检讨传统学术经史关系复杂的变迁过程,而是以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儒者为切入,通过考察其《春秋》学思想以尝试梳理他的经史观,并借此窥见传统儒学或理学家对于经、史关系的一般态度。

[收稿日期] 2023-03-15

[基金项目] 2022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杨时与道南学派历史哲学思想研究”(22ZXC003);2022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哲学思想研究”(2022SJYB0247)。

[作者简介] 王新宇(1991—),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儒家哲学与朱子学。

这位儒者,便是朱子。

一、经与史

皮鹿门谓:“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此语确然。照古文家之讲法,经学之渊源远承三代,然无可否认的是,直到孔子,《六经》才正式成为一个义理通贯的整体,更不必说《春秋》一经,本就为孔子所自作。另一方面,《春秋》虽为经,然其所书写者,不过为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春秋》大义,莫不蕴含于这段风云诡谲的历史之中,故无妨认为《春秋》是因其特有的史书特色而呈现于后世的圣人之经。“总之,材料虽是古昔的史官文书,孔子却对这些材料予以了微言大义的解释。”^{[1]48}这点在史学家亦未尝否认。当然,今文学家绝不能同意这一观点,皮鹿门明言:“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2]2}皮氏以今文眼光视《春秋》,遂谓《春秋》是经而非史,是孔子寓王心于史事之作,而非仅为旧史作记录也。皮氏又论及经、史之别,而所谓“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2]2},实为针对朱子之《春秋》思想而发。

朱子于《春秋》有一著名评语,即谓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3]2146},未尝着意于一字褒贬之间,此即朱子《春秋》学之基本观点——反对于“一字褒贬”处求《春秋》之义,故对于后世“条例”之学亦一并反对之,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之态度直探《春秋》大义。朱子谓:“《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3]2144}《春秋》之义,如是而已。因此,皮氏据守今文家之立场而判定朱子是以史学视《春秋》,亦无足怪。问题在于,皮氏与朱子所理解之史学是否存在差别?或者说,朱子对于经、史关系的理解,是否与皮氏存在不同?此即涉及到朱子的经史观。简而言之,在朱子那里,经学与史学作为学问之不同形态,其在圣人处皆可以作为道理的载体而成为学者的学问之具,二者之间的距离并非如今文家那样所认为的冰炭之别;同时,经、史之间的差异性也当然存在,然其差别并不在于是否合乎道理,而在于道理呈现之方式有不同——经学之重心在发明“义理”,史学则蕴“义理”于“史事”,理言其常,事则谈变,故相比于去复杂多变的史事中穷理之是非,经学更能使学者之心专一于义理而不放逸。此其所以不同。

《春秋》一经则因其文本的特殊性,就成为理解朱子经史观的绝佳注脚。在朱子,《春秋》是圣人生平的最后一段义理,是孔子最重要的经学;同时,《春秋》亦是最好的史学,因其为圣人制作,故可视为后世史学之最高标准。经、史虽有别,却无害其互相资取,尤其在传统那里,经、史本不如后世“四部”那样有一个严明的判分,《七略》亦不曾分经、史为二部,汉儒所严判者在于“经子”而非“经史”。皮氏以经、史之别割裂《春秋》,未必能得圣人制作之精神与汉代经学之原貌。反观朱子以《春秋》为经而亦有史学之特色,方是透彻于经典制作之原委。《公羊》学者之持论则正相反,其论朱子之《春秋》学曰:“朱子论《春秋》,实持一史家之立场,故其褒《左氏》,不过以其详于记事耳。”^{[4]724}此说后半截诚是,而谓朱子“实持一史家之立场”,则实在未能体认朱子《春秋》学之奥义。朱子常教人去读《左传》,皮氏乃谓:“《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4]724}今文学以《左氏》为史而非经,故皮氏即因朱子曾有肯定《左传》之处而认为朱子以《春秋》为史学而非经学,殊不知朱子之肯定《左传》,亦是从史学立场出发,而非从经学之立场着眼也。且朱子之于《春秋》,断断然以其为圣人之经,而绝非史书而已;只不过朱子并不会像今文家那样去理解圣人之经,也并不会将“经”与“史”决然分裂视之,而是采取一种立足于“义理”之正而

互通经史的视角。

有见于此,本文将从朱子之褒扬《左传》之史学价值处出发,说明朱子对于《春秋》坚定不移的经学态度,且同时不否认其史学特质,以及由此而引发对于经、史关系的讨论。朱子的理解不仅拔高了史学的地位,为史学提供了极高的标准,同时也是对《春秋》经学地位的再次肯定,是衡准于圣人“义理”而对经、史关系作出的精彩解读。

二、且据《左氏》

《公羊》家言朱子多有褒扬《左氏》之处,确非虚语。《语类》载之不一: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3]2148}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3]2149}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3]2151}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穀》较难凭。^{[3]2151}

朱子确实对《左传》多有肯定,且相比于《公》《穀》二家,《左传》诚有其优胜之处。然朱子对于《左传》的肯定皆在史事层面,如说“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春秋》本于鲁史旧文,《左传》载史事尤详,故参照《左传》可以考见圣人作《春秋》所引据的鲁史之大概,这即是从史料之完备的角度肯定《左传》的价值。又如言“《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圣人之作《春秋》,殆据当时史事而实录之,《左传》一书则记录了不少当时之历史情实。与之相反,《公羊》《穀梁》对于《春秋》所记载之史事并不关心,甚至有为了证成义理而附会历史的倾向,因此从史料角度看,二《传》之说多有不可据信之处。

事实上,三《传》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同已为历代治《春秋》学者所重视。杨氏拱辰云:“《公羊》虽然是历史学派,但他们主要发挥历史哲学而不注意史实,他们不免曲解史实以附会他们的理论。郑玄则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因为学识渊博,所以在争论中可以左右逢源,他反对曲解史实的学风,何休遭遇到学术上的劲敌,以致他有‘入室操戈(矛)’之叹。”^{[5]424-425}可见,《左氏》之胜场在历史,《公》《穀》二家之领域则属哲学,这一区分确乎存在,因此郑君在反击何氏之时,即多据《左氏》在史事、礼文上相比《公》《穀》二家更加可靠的这一特点,故虽何氏本人亦徒唤奈何。朱子论三《传》之优劣,其所以肯定《左传》者,亦多在史学方面。朱子说: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3]2152}

此说与上文所引皮鹿门之言,何其相似。皮氏谓:“《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其站在今文学之角度,将三《传》之不同视作是经、史的对立;皮氏虽对朱子之《春秋》思想多有批评,可朱子在这里明确说“《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居然和皮氏论述一模一样,可知皮氏之批评朱子,实存在相当程度之误会。在朱子看来,《左传》一书的优胜之处,即在于其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史学功能,如朱子常教人去读《左传》:

人只读一书不得,谓其傍出多事。《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3]189}

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3]195}

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3]195}

《左传》即史书之代表也，故不可不读。朱子晚年尝作《学校贡举私议》一文，成于庆元元年，备论学校选举之法，在考试方面认为需要经学、子学、史学并举，其中在论及史学考试科目的时候，朱子对史部典籍及其科目类别有非常详细地划分：

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6]3637}

此处则以《左传》居于诸史之冠，盖以年分次也。又朱子论经学之科目云：

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诸经则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6]3637}

此处言经学书目的部分，又将“三《传》”与《春秋》并立，似乎亦肯定《左传》之居于经学一类。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所论学校考试之制，采用的是为朝廷所认定的、一般的经学讲法，即三《传》并立。在朱子自己的理解，则《左传》自是一部史书，经学价值甚少。如此处朱子将“二戴之《礼》”亦放置在了经学科目之中，但朱子却曾明言“二戴之《记》，已非正经”^{[6]3636-3637}，三《礼》之学，为朱子所重者在《仪礼》《周礼》而非《礼记》，故其言史部科目时又列入《通礼新仪》，盖即以礼学与时务关系密切，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又尝将《礼记》与《左传》并列称之，说：“《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都可以看出以朱子以《左传》为诸史的这一基本观点。倘若皮氏详察以上朱子对于《左传》的种种看法，恐怕便不会说朱子“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之说不合”^{[2]71}。何况，杜预之为古文家，其对于《左传》的态度显然与朱子不同。杜氏云：“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7]1}《正义》释之曰：“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修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修旧，明修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8]38-39}元凯所论，乃以《春秋》为周公之志，《春秋》一书的渊承在于王国史官之职。古之有史官，记言记事，又系之以年月日者，即《春秋》叙述方法之所承自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孔子乃以其大夫之后的身份行天子之事，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官本为王官旧制，惟天子可以节制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无位之身份行天子之权柄，从古礼来看实属僭越，故古文家必曰《春秋》乃遵周公之志而作，始可避此忌讳。在古文家眼中，《春秋》本于王官学之史官传统，此处之“史官”与后世之“史学”不同，而与章学诚氏“六经皆史”之义相类，盖以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钱宾四先生于此论之甚明：“章氏之意，乃谓古代《六经》皆即当时政府之‘官书’，犹之后世衙门之‘档案’。……若把章氏主张配合杜预之所说，谓孔子《春秋》，乃遵周公遗制，用旧史之原文，遵周礼之成规，岂不正可说明了孔子《春秋》所以亦得侔于一经的理由？而杜预此说，实大背于西汉《公羊》学派的意见。”^{[9]232-233}若详考朱子思想，则显与古文家不同，朱子谓《左传》为史，乃是顺着后世经、史二科之划分而言，《左传》是史书，如同于《史》《汉》之伦，非古文家之所谓“史”，古文家之“史”，其实即是“经”，而古文家之“经”，实为孔子所继承的王官之旧传统——孔子之经皆周公之典也。这与朱子的区别是显然的，在朱子那里，《六经》尤其《春秋》的意义是由孔子所赋予的，且必须是由孔子所赋予——这一态度毋宁说更接近于今文学者。

对于《左传》的作者问题，朱子亦有所讨论，且同样与古文家相异。古文家以《左传》作者为左丘明，左丘明为鲁史，与孔子过从密切。孔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0]82}杜元凯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7]1}孔仲达则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8]39-40}可见，在古文家那里，《左传》之作者与孔子的关系十分紧密，这便证明《左传》思想与孔子《春秋》联系密切。然此说在宋代即遭遇前所未有之怀疑，疑古之风为宋代经学的特点之一，此所谓“古”，盖即针对汉代以来之旧传统。这其中便包括对于《左传》作者之质疑，王荆公、郑夹漈皆尝论之，朱子亦然。朱子曰：

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传者乃左氏，别自是一人。是抚州邓大著名世，字符亚。如此说，他自作一书辩此。^{[3]748}

《语类》此条为关于《论语·公冶长》篇“巧言令色足恭”章之讨论，朱子以为此章之“左丘明”复姓“左丘”，与《左传》之作者“左氏”并无关系。朱子于《集注》引程子之说为：“左丘明，古之闻人也。”^{[10]82}则程子也并不以左丘明为《左传》之作者。有关《左传》之作者究竟为谁，朱子论之非一：

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国语》与《左传》似出一手，然《国语》使人厌看，如齐楚吴越诸处又精采。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籍田等处，令人厌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3]2147}

或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3]2153}

朱子以《左传》之作者左氏为楚左史倚相之后，此说盖本之夹漈郑氏。郑氏《通志卷二十八·氏族四》有“左氏”条载：

姜姓，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为氏。楚有左史倚相。左史，老者以为左史官，故亦为左氏。望出济阳。^{[11]467}

此条论“左氏”源流，后有按语，云：

所著《春秋传》，即倚相之后，世为楚左史官，非左邱明。明居左邱，为左邱氏，非左氏也。^{[11]467}

此即朱子说之所本。由上可见，朱子不仅根据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左传》与左丘明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从“义理”角度出发，怀疑《左传》之作者绝非左丘明，即所谓：“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又一条云：“丘明所耻如此，《左传》必非其所作。”^{[3]748}依朱子，孔子盛称左丘明之“耻”德，刘歆言“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12]1967}，然观《左传》之义理，纵横诡谲，多有悖于圣人之道处，正所谓巧言令色之言也，又岂是左丘明之所为？

综上，朱子之肯定《左传》，全在其史料价值与史学功能，而非其他，并通过否定古文学家有关《左传》作者的认定，从而消解了古文学对于《左传》义理的权威认证。由此，《左传》只不过一部详述春秋历史的史书而已，读之可以考察当时之时事政经、礼文制度与地理风俗等，而无关大义。如朱子言《左传》对于卜筮的记载可以作为考证古人卜筮之法的依据：

有所谓“繇辞”者，《左氏》所载，尤可见古人用《易》处。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

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3]1647}

《左传》记载占卜事甚多,考之可见当时占卜学之发展。又以《左传》为据考证《诗小序》所言之有据与否:

《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3]2078}

但无论《左传》有这样那样的价值,通过《左传》讲明《春秋》之义却是不可能的,因其“义理”多与圣人相违。这些论断,多可成为今文家之资藉。有意思的是,朱子的《春秋》学思想不仅不被视作今文学的助力,反而招致批评——这大概就是清代汉学一味反宋、反朱的连锁反应吧。事实上,清代《公羊》家之攻讦《左传》,常常藉助于宋儒怀疑《左传》作者的讨论而继续深化之,在反宋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受到宋学的影响,这又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三、《左氏》之病

朱子之称许《左传》者,惟在其史料价值,而并不在对《春秋》大义之发明。相比之下,朱子对于《左传》的批评甚至是不屑之处则更多,且都是对《左传》在义理上的病痛给予严厉之揭示。《语类》论《左传》之病,所在多有: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3]2149}

《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3]2149}

《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3]2149}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穀》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3]2151}

《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3]2160}

《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3]2952}

此皆批评《左传》义理之卑陋,盖以其偏向于功利之说,而多与圣人之道相悖反。在讨论《左传》的一些具体内容时,批评亦随之而激烈:

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穀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3]2149-2150}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3]2150-2151}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

“《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3]2150}

《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3]2155}

只《左传》是有多难信处。如赵盾一事，后人费万千说话与出脱，其实此事甚分明。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他终不成亲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贾充成济之徒。如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看《左传》载灵公欲杀赵盾，今日要杀，杀不得；明日要杀，杀不得。只是一个人君要杀一臣，最易为力。恁地杀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来许多说话，自是后来三晋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来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3]3268}

以上举《左传》中诸史事，以批评其义理之卑陋。如周郑交质、赵盾之事等，并论及《左传》中的“君子曰”这一体例。“君子曰”一般是《左传》作者对此前史事的议论，常常凸显出《左传》作者对于历史的评判标准，而朱子对“君子曰”在义理上的浅陋之处是十分不满的，认为这些议论不合道理，都是“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左传》在经学义理上的价值，也侧面引证了《左传》的作者一定不是那位孔子称赞有“耻”德的左丘明。反过来，朱子在批评《左传》之义理的同时，对《公》《穀》二家却多有肯定，如上文所引《左传》“君子曰”一段“宋宣公可谓知人矣”云云，朱子在批评《左传》的同时，也表彰了《公羊》的“君子大居正”之说（按，《语类》录为《穀梁》，盖记者之误。）。又如赵盾弑君之事，《左传》以孔子之口吻谓：“惜哉！越境乃免。”朱子则明确表示此断非圣人言，赵盾之所为，分明是弑君，圣人若作此回护之语，则与其“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宗旨相违背。《公羊》亦明言赵盾弑君，然按《公羊》例法，弑君者不复见。宣公二年书赵盾弑君，六年乃复见，《公羊》解之曰：“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而何？’”^{[13]620-622}则犹有怜之之意，盖圣人善善速、恶恶缓之义也，这也就与朱子的《春秋》学思想不谋而合了。且朱子又从《左传》载灵公欲杀赵盾而不能等处，见赵盾专权之事实，日后遂酿篡弑之祸，并举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之史事，言“他终不成亲自下手”，可见在朱子处，赵盾弑君尤为不可恕，甚至相比于《公羊》犹有怜之的态度还要激烈。朱子严守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核心精神，倡明《春秋》君臣大义之伦，其立义之严，犹在《公》《穀》二家之上。在理解圣人的《春秋》大义时，朱子始终秉持其严正的义理立场：

《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3]2160}

“一开首，人伦便尽在”，《春秋》大义，正在此正名分、道人伦处。可见朱子对《春秋》义法之强调，相较以“义例”为准绳之今文学，实不遑多让。若再细究本文所论朱子之对《左传》的褒贬，则更不难发现，朱子所褒扬的这种炳如日星的“大伦大法”主要存在于《公》《穀》二家而非《左传》之中。

《语类》又一条论《左氏》之失：

《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尚可谓其善恶同圣人哉！又如论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是何等言谈！”可学曰：“此一事，《公羊》议论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3]2959-2960}

《大学》言君臣父子之大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朋友交,止于信。”^{[10]5}《春秋》所言天理人伦之义,皆在其中矣。《左传》却未能发明此中大义,故与圣人之学不牟。《公羊》乃儒者之言,为其大义不失其正,而能知此人伦之大者。朱子对于三《传》义理之评断,大率类此。学者言朱子是从“天理”之正来评鹭三《传》,当然如此。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朱子是以史学立场来看《春秋》的,若以史学立场,那因何而如此批评《左传》,以致于出言常甚激烈?且经学与史学之关系,不应该视作完全分裂之二者,在朱子看来,《春秋》诚为经学,然亦从不无视其拥有史学特色这一事实,朱子之褒贬《左传》,即立足于此一种经、史交互之立场,而非如《公羊》学者那样必欲去《春秋》之史学性而后快。朱子与今文学家对于《春秋》理解之分歧,亦并不在《春秋》是否为经学,而在于《春秋》是如何体现其为圣人之经的,或者说,《春秋》作为经学,是通过何种方法诠释圣人之道的——这才是二者之不同。依朱子,《春秋》作为圣人之经,其核心精神即在于孟子所言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方法则是通过史学的形式,“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基于圣人之心的大中至正,通过对历史的忠实记述,从而使得后世之人能清楚地明白当时历史之真相,知所戒惧,以为善去恶——朱子的《春秋》学主张即在此。

这一理解和朱子对《诗》的诠释其实颇有类似之处。在朱子,《诗》为圣人之经,而圣人心与理一,固不会语乱。然圣人所以删《诗》之意,乃在于其正者存之以以为法,其不正者亦存之以以为戒,所谓“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10]53},此即孔子“思无邪”之意,而非如后世经学家所言,篇篇有美刺,且皆可归之于某个特定之历史事件,以致将明明多为描写淫奔之内容的《郑》《卫》、桑、濮之诗,皆文之以《雅》乐之名,以为皆有美刺之义,用之于宗庙朝廷之上。这显然与圣人作经之心不符。同理,朱子所体认的圣人作《春秋》之意亦如是。《春秋》所载无非乱臣贼子之事,此毋庸为之讳,圣人但存其事而已,以见当时周道之衰、风俗人心之变,使后人读之而知尊王攘夷之义,严君父之大节而推王道之公心,乱臣贼子读之亦未尝不有所恐惧,而不敢放肆于其间,此即《春秋》大义之宗旨也。非如后世经学家之所言,认为必欲于字里行间求得圣人之一二道理,认为圣人在著作《春秋》之时也是如此这般地琐碎造作、委曲求全,这就反而有违于圣人自然之公心了。朱子与今文家对于《春秋》理解之分歧实在于此,而非其他。站在今文家之立场,当然尽可质疑朱子的理解,然若怀疑错了地方,以为朱子将《春秋》视作史学而非经学,则不免大闹误会,愈说而愈远矣。相比而言,同为今文家的皮鹿门,虽亦批评朱子之《春秋》学,然对于朱子之说,亦不乏称许之辞:

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胡《传》曰:“无其位而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羣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2]2}

皮氏说本《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10]276}

朱子注引胡氏曰：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10]276}

朱子又为之说曰：

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10]276}

朱子当然不是《公羊》家，但于《孟子》此章发明《春秋》之义，确有如皮氏所言暗合《公羊》旨意者。诚如皮氏所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周秦诸子旧籍，多有可以与经典大义会通之处，盖门弟子承先师之说，虽各自有所发展，却皆源自圣人《六经》之本原。《公羊》家言如此，亦足证后儒以朱子视《春秋》为史学之说，可不攻而自破矣。

综上，通过朱子从多个方面对《左传》所展开的质疑与批评可见，朱子始终立足于《春秋》大义的正立场，不满《左传》以其史学特质而割裂了圣人经义的特征。相反，朱子对于《春秋》义理之弘扬多与《公羊》《穀梁》二家之学说相发明，这虽然不代表朱子的《春秋》学是今文家的，但的确可以肯定朱子恒以经学来看待并推崇《春秋》，而绝非史学。只不过，朱子所理解的这种经学，既不同于今文家之尽废史事，也不同于古文家之“六经皆史”，而自有其新义。这个新义，就是立足于理学对圣人之心的体认而得出的对经史关系的新认识，即——先经后史、经史并重，而裁以“义理”之是非。

四、先经后史

朱子之学，尤其重视为学次第，为学则须读书，读书之序，乃主先经而后史、先《论》《孟》《四书》而后《六经》：

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6]1535}

此理学家为学之基本教法。然朱子亦不废诸史，学者读经之余，更须读史：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3]2148}

问读《春秋》之法。曰：“无它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3]1318-1319}

上一条潘时举所录，时举癸丑以后所闻，则此条所记乃绍熙四年之后事，盖朱子晚年之说也。下一条沈僩所录，戊午以后所闻，为庆元四年，亦晚年之说。则知朱子晚年，亦以“只如看史样看”教弟子之读《春秋》，且引读《史记》之法以为说。不以“一字褒贬”作为圣人作《春秋》之义法，而教学者以义理折衷之，这是朱子《春秋》学的一贯讲法。因此，朱子常教人在读《春秋》之前，先须研习义理，“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看”：

不如且研究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3]2148}

朱子意，学者如欲体认圣人心、研习圣人之道，应当以穷究义理为先。义理明，则学者之心自然正大，然后从事于具体的学问之中，则可触类而遍通矣。读书则为穷理之重要一端，而读圣人之

“经”更是学者读书穷理之首要途径。就《春秋》而言,《春秋》大义无不关乎圣人所阐明之义理,然却是隐藏在具体而驳杂的历史时事之背后,学者若不能研究义理,便去具体的历史时事之中寻讨道理,必然存在很大的危险。朱子教人读《左传》,是因为《左传》载事颇详,对于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有所帮助,但又批评《左传》,乃因其于义理上有差。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子常教学者须先经而后史,不可以《左传》为先务:

今须先正路头,明辨为己为人之别,直见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则思虑自通,知识自明,践履自正。积日累月,渐渐熟,渐渐自然。若见不透,路头错了,则读书虽多,为文日工,终做事不得。比见浙间朋友,或自谓能通《左传》,或自谓能通《史记》;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当理会,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来说甚盛衰兴亡治乱,这个直是自欺!^{[3]2757}

向见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语》《孟》为虚著。《语》《孟》开陈许多大本原,多少的实可行,反以为恐流于空虚,却把《左传》做实,要人看。殊不知少间自都无主张,只见许多神头鬼面,一场没理会,此乃是大不实也!又只管教人看史书,后来诸生都衰了。……^{[3]2896}

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古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3]195}

以上诸条,皆朱子所论为学之方,以及阅读经、史之先后关系。经言义理,史言实事,故吕伯恭以为《语》《孟》为虚著,而以《左传》等史书为实学。然此不过本于形而下之事情论虚实,而非基于“义理”。以“义理”言之,经文所载,正为著实之道理;史书所说,则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学者若对道理本身没有扎实地掌握,即便做到将史事了然而胸,也不过是虚有之泛观博览,与身心性命无涉,“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并非自家之身心对义理实有所得。因此,只有将具体的史事,裁定以恒常的义理,才是正确的治学方法。《语》《孟》纯言道理,故为学者之先务。若《春秋》一书,则是以史学为载体,衡之以圣经之“义理”,是以经学而将经、史二者熔汇一炉的最佳典范。因此,虽不免“只如看史样看”《春秋》,然此不过是取其史学之价值而已,如《左传》;读《春秋》之根本目的,必在于“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由史事背后考见圣人“义理”,这才是朱子《春秋》学的根本立场,也是朱子经史观的正确展现。

在朱子看来,圣人“义理”一以贯之,通过经学而作为一切学术的统领和典范呈现,给包含文学、史学在内的一切学术提供框范,而框范的标准即在义理。朱子之治《春秋》,即重在发明圣人之“义理”,以助推学者之“明理”,而其书之史学特质,必须在“义理”的裁定下得到安顿,在“明理”的工夫中得到落实——“先经后史”的背后逻辑在此。朱子之褒贬《左传》,正是基于这一立场。

五、余 论

本文通过朱子对《左传》的理解与评论,展现的正是朱子《春秋》学贯通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基

本态度,而这一“经史互通”的《春秋》学立场又必本诸圣经之大义,严守圣人名教之底线,并以此作为理解《春秋》大义的唯一标准,故必曰“先经后史”。由“经史互通”而“先经后史”,经史之间所呈现的复杂关系,正恰反映了朱子《春秋》学思想的根本精神。

同时,这一先经后史、经史互通的经史观,正是对汉儒经术的继承。太史公之《春秋》学宗董子,董子诚一今文家,而又兼采于古文《左传》,故《史记》所载史事,多本《左传》,此即与朱子义采《公》《穀》,事则《左传》之说相类。史公著作《史记》之精神一本于《春秋》;而其书之于后世的影响,则在史学。孔子作《春秋》,以一家之言而为天子之事,今文家所重,则在孔子的“一家之言”,古文家所重,则在此为“天子之事”;故今文家侧重于其为孔子之义,而古文家则侧重于其为周公之史(按,此“史”与后世“史学”有所区别,乃指王官学而言。);一为经学,一为史学,太史公则兼而有之。可见,经与史之关系,既牢不可分,又互相融汇。今文家虽言:“《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特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有,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续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2]77-78}然亦未可否定,《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岂可谓之与史无涉?“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则《春秋》诚然为圣人之经,而非仅一史书。今文家欲辟古学,故凡遇见言《春秋》为史之说者,即不遗余力而痛斥之,必欲断绝《春秋》与史之联系而后可,此举虽若遵经,实则降低了经的地位。或者毋宁说今文家之尊经实是尊孔子以下儒家经学之新传统,古文家之崇史乃是尊孔子以上三代王官学之旧经典。

又,钱宾四云:“谓《春秋》亦如后世一史书,此非贬抑《春秋》,乃是大大提高了史学地位。谓看史书中是非得失成败盛衰,须将自己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此则朱子平日教人为学先经后史之要旨。若胸中先无一番道理,则易为历史上种种权谄功利所摇撼迷惑,以为义理即是如此,而无所折衷,此乃朱子所深戒也。若如《春秋》,乃以圣人作史,既能据事直书,亦复大义昭然。……”^{[15]114-115}后儒讥朱子以《春秋》为史书,谓“夫使《春秋》不过随事直书,别无书法,则一良史优为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赞一辞?何以齐、鲁师儒递有授受?何以《孟子》谓之作?谓之乱后之一治?何以《荀子》谓其微?”^{[16]14}今文家之批评朱子,多有误解,上文已论。然纵使以史书之标准绳之,则《春秋》之作,岂仅仅是“一良史优”所能为的?太史公诚可谓之良史矣,然《史记》于圣人义理处一向驳杂,朱子对此即多有批评。可见,《春秋》之书,乃如钱先生所言,“乃以圣人作史,既能据事直书,亦复大义昭然”,此事惟圣人为能之,而绝非一良史可尽。惟圣人著史,不仅能据实以记录当时历史之实况,又能从中揭明人伦之至理,此所以《春秋》为经,而亦无碍于其为最好的史学。朱子之《春秋》学,毋宁是对圣人作《春秋》之义的衷实还原,而以《春秋》“义理”衡之史学,则又是为史学提供了无上之标准。朱子自己,终生不解《春秋》,则不啻又是对“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一种继承。今文家谓“汉人首重《春秋》,以《六经》之学,《春秋》为入门首功”^{[17]10},朱子则以《语》《孟》《四书》为初学入德之门,《春秋》则非学者所当先,是知其“先经后史”之微意,莫不是为学者之修身成德计,此其经学思想所以能与理学工夫熔于一炉也。

[参 考 文 献]

[1] 内藤湖南. 中国史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2] 皮锡瑞. 经学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3]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4] 曾亦, 郭晓东. 春秋公羊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5] 程元敏. 汉经学史[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8.
- [6] 郭齐, 尹波. 朱熹集[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 [7] 杜预. 春秋左传集解[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 [8] 阮元. 阮刻春秋左传注疏[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9] 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10]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1] 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3] 何休, 徐彦. 春秋公羊传注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4]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5] 钱穆. 朱子新学案: 第四册[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16] 钟文丞.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7] 廖平. 穀梁古义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责任编辑: 谢光前)

Links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Zhu Xi's Thought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ith the Focus on The Commentary of Zuo

WANG Xin-yu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Zhu Xi's concept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philosophy. His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are: "classics before historiography" and "links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which were based on his ultimate proposition of "Right Principle".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basi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learnings consists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that both belong to the structure of Confucius' "Right Principle". Zhu Xi's thought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precisely reflect on the features above. Zhu Xi admitted the historiographical values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 while criticized its mistakes for lacking Confucius' "Right Principle". This idea can comply with the standpoint tha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s a book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lso set up a high standard for histori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Zhu Xi's idea on the links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is perfectly shown.

Key words: Zhu Xi;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Right Principl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Commentary of Zuo